



短篇小說評論集

北京出版社

短篇小說評論集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短篇小說評論集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3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開本：787×1092 1/32·印張：4 8/16·字數：91,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9,000冊

統一書號：10071·174 定價：(6)0.36元

統一書號：10071·174

定 價：(6) 0.36元

AG 36/10

目 录

《故乡》	韓書田 (1)
《風波》	沈仁康 (7)
談魯迅的《一件小事》	唐 駿 (14)
談談《社戏》	樊 駿 (27)
讀《孔乙己》	何家槐 (35)
《春蚕》中农民形象的性格描写	乐黛云 (43)
茅盾的短篇小說《林家鋪子》	乐黛云 (63)
讀茅盾的《当鋪前》	林志浩 (69)
叶聖陶的《夜》	公蘭谷 (71)
关于《多收了三五斗》	何家槐 (78)
《华威先生》的艺术形象	乐黛云 (85)
《在其香居茶館里》艺术欣賞	孟 照 (94)
艾蕪的《石青嫂子》	公蘭谷 (102)
关于契訶夫的《宝贝兒》	天 蘭 (110)
契訶夫的《凡卡》	歐陽文彬 (117)
讀《二十六个和一个》	仲 持 (122)
关于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叶君健 (129)
都德的《最后一課》	歐陽文彬 (133)
后記	(140)

《故 乡》

韓 書 田

《故乡》是魯迅的一篇短篇小說，發表于一九二一年，主要描写辛亥革命后十年来的中国农民生活。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但是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并没有真正推翻，作为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的农民問題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投靠帝国主义的各派軍閥連年混战，地主階級及其官僚統治機構，对农民进行層層的压榨和殘酷的剝削。中国农村經濟瀕于破产，农民生活日益貧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阶段。工人階級的力量迅速成長壯大，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便以革命的領導階級的姿態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但是，工人階級暂时还没有跟农民結合起来。这就是《故乡》反映的時代的基本情况。

作品一开始便描写了农村的破产景象，深冬时节，天气陰晦，冷風鳴鳴地吹着，从船艙的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远近橫着几个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气”。在这些“荒村”里生活的主要是农民。

作品里刻划了农民閩土的形象，描写了少年閩土跟成年

閩土的不同情况。少年閩土，“紫色的圓臉，头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銀項圈”，为父亲所疼爱，性格天真爛漫。到了成年，“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变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多的皺紋”，先前是“紅活圓实的手”，現在也开裂得“像是松树皮了”，神气板滯、沉默，甚至像个木偶人。这种对比描写，当然不在于表現閩土的年齡增長所引起的变化，而在于表現作为一个农民，他的生活痛苦的深重。有人从表面理解作品，看到少年閩土被描写得那样天真可愛，成年閩土則被描写成形容枯干、飽經悲痛、苦不堪言的样子，便認為作者厭弃現狀怀恋过去的时代，这当然不对。作者描写少年閩土，主要是为了更具体、更鮮明地描写成年閩土。就是說，描写少年閩土，主要是用来跟成年閩土对照，显示成年閩土生活的悲惨景况，同时也显示閩土的生活由少年到成年日趋惡化的变化。实际上，中国农民在閩土的少年时代和成年时代，都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榨的，生活都非常痛苦。只是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榨的日益凶殘，中国农民的生活也就愈来愈痛苦罢了。作品里少年閩土跟成年閩土的不同情况的对比描写，正是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熟悉农民，从小跟农民就有着亲密的联系，关心农民問題，一开始便把农民作为自己小說的中心人物的作者，在《故乡》这篇小說里不只表现了农民生活痛苦的現象，而且揭示了造成这种現象的原因。作品里写道：

我問問他的景况。他只是搖頭。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

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錢，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爛掉。……”

.....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嘆息他的景况：多子、飢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从这里，便不难知道，造成閩土生活痛苦并使其一天天貧困、惡化的原因，不是別的，正是封建階級及其官僚統治機構的層層压榨和殘酷剝削。揭示这个原因，也就是直接对封建階級及其官僚統治機構的抨击。我們还看到，閩土从自己的生活經驗里已經有些感觉到了，他說“什么地方都要錢，沒有規定”，害得他“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錢，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爛掉。”这里不是說明淳朴的农民已經看到造成自己生活穷困的原因嗎？尽管閩土的这种認識还多半出于直感，尽管他当时还没有積極的反抗行为，然而在这里也可看到农民这种在内心里积郁的憤恨，暂时尚被慣常的忍耐掩埋着的不滿，具有爆發的可能性。因此，这种描写完全符合历史真实情况。当时正处在一九二四——二七年革命的前夜，中国的各种矛盾已經达到尖銳化的程度，农民的觉悟比以前提高了，对敌对階級的仇恨也愈發增强了。一九二四——二七年革命时期，共产党領導的勢如暴風驟雨的农民革命运动，便是明显的証明。

从作品对楊二嫂的描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痛苦，以及他們在旧社会里所遭受的毒害。作品里写道：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門的豆腐店里确乎終日坐着一个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

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

這裡雖然沒有寫她吃穿如何壞，但是擦着白粉終日坐在豆腐店里借以招徠買主的事實，也是頗為辛酸和沉痛的！這裡表現了她在精神生活方面所受的侮辱。

楊二嫂這個被壓迫、被侮辱的婦女形象，受到舊社會的毒害，沾染了一些壞習氣，溜嘴刮舌，愛沾小便宜，甚至偷人家的零碎物件等。楊二嫂的壞習氣，跟她作為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的社会地位不相稱，當然是不好的，應當受到批判。作者正是給予了有力的批判的。但是這種批判畢竟跟暴露剝削者、壓迫者的罪惡不同。作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里，說他的作品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篇小說里，對楊二嫂的描寫就有這個意思。楊二嫂的壞習氣產生的原因，是生活的壓迫和侮辱。生活的壓迫和侮辱來自剝削階級，因而批判楊二嫂，同時就是揭露和控訴剝削階級的罪惡。正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壓榨和這種壓榨的日益殘酷，使得楊二嫂到了老年，景況就更為悲慘了。只看她那干瘦的外貌，便可證明這一點。

為了正確地理解《故鄉》，了解作品里直接出面的作者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出現在作品里的作者占很重要的地位。了解了作者，便很容易領會作品的濃厚的抒情氣氛了。這種抒情氣氛，基本上是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的表現。首先是对祖國大自然的愛。這具體的表現在鄉土愛上。作者腦子裡的故鄉的海岸，是“一幅神異的圖畫”。看吧，“深藍的天空中挂着一

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的作者，對於祖國大自然的愛，跟那些有閑階級的人們，出於閑情逸致，以單純的游山玩水的態度欣賞風景是有區別的。他對祖國大自然的愛，是因為我們祖祖代代生活在这塊土地上，這塊土地養育了我們，我們又以辛勤的勞動使它愈變愈美。就是說，這種對大自然的愛，是跟人民的生計聯系在一起的。作者在描寫故鄉海濱的美景時，跟描寫少年閩土結合在一塊，以致使人不能截然分開到底是描寫自然景色還是描寫閩土，也正是這個道理。實際上，作者腦子裡的“神異圖畫”，根本就是既包括自然景色又包括閩土的。正因為如此，作者對同是故鄉的大自然，有着兩種不同的態度。在描寫少年閩土時，描寫了自然景色的美麗，但在作品開頭，則描寫了自然景色的蕭索和荒涼。這個原因，作者自己說得很清楚，“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那時，我們祖國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榨和蹂躪下，民族危機深重，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真正的愛國者，心情自然是沉重的。作者的“心緒”，正是這種心情的反映。

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作者對人民是熱愛的。這里首先表現在他對閩土的態度上。這一點作品里表現得很明顯，不必細說，只要提出作者對於出身和職業使自己跟閩土“隔絕”一事所感到的氣悶和悲傷便夠了。

最後，還應該提到，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作者不能不對祖國的前途和人民未來的生活給予關心和希望。作者雖然還沒有明顯地指出前途應該是怎樣的，但對未來“應該

有新的生活”一点，却充滿了信心。作品結尾写道：

我在蒙眛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綠的沙地来，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挂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这里，“神异的圖画”又出現在作者眼前了。这幅“圖画”不仅是二十年前的回忆，而且是作者希望中的未来的景象。作者深信祖国是有美丽的前途的，同时，也号召人們为祖国美丽的前途，开辟新的道路，进行斗争。

总结以上分析，我們知道，这篇作品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一九二一年这一时期农民的日趋惡化的痛苦生活，揭露了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譴責了压迫者、剝削者的罪惡，表現了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这就是这篇小說的基本思想意义。

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于北京

《風 波》

沈 仁 康

《風波》写于一九二〇年十月，收在《呐喊》里。虽然篇幅很小，但是深刻地反映了一九一七年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

小說的开头描写了太陽已經落山，人們把小桌子和矮凳放在門口的土場上，搖着大芭蕉扇閑談着，孩子跑跳着，这是一幅恬靜的农村的傍晚的景色。但是并不恬靜，这个沒有受到革命浪潮冲激的、一切按照習慣生活的小村子，却引起了風波。而風波是由辮子問題引起的。魯迅先生不是單写了个别的这样的小村子，这小村子有着概括的意义，代表了当时一般的农村的面貌。

《風波》的故事由“皇帝坐了龙庭了”，“皇帝是要辮子的”，而船夫七斤的辮子却在“造反的时候”（指辛亥革命）进城被人剪去了的綫索展开的。作品中的赵七爷說过：“……大兵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薦的是張大帅……，”这个張大帅就是指張勳。《風波》也就是以張勳复辟事件在农村中激起的風波为題材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件大事情，它的最大功績是推翻了清朝封建統治，但是它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不徹底性，加上远远地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失敗了。辛亥革命后，出現的并非独立的民

主主义共和国，而是中国人民仍处于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軍閥地主等反动势力的重压之下，处于貧困落后的状态中。在《風波》里我們看到农村封建势力的統治仍然是黑暗的，封建思想依然濃厚地籠罩着农村，我們看到人民群众仍处于保守、落后甚至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正由于辛亥革命对反革命势力的妥协性，才有后来的袁世凱称帝及張勳复辟事件。一九一七年七月，張勳与清朝的遺臣商議，陰謀地把已廢了的宣統重新捧上宝座，企圖推翻革命势力，恢复封建王朝的反动統治，宣告了复辟，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但是，这个反革命陰謀激起了公憤，听到复辟的消息，全国人民紛紛声討，于是这个可恶的丑剧只演了十二天就狠狠地宣告破产了。因此《風波》中所描写的一場風波也只有十来天功夫，很快就平息了。这是《風波》的时代背景。

張勳复辟事件，是革命运动的失敗，是反革命势力的抬头，这样关系全国人民的革命与反革命尖銳地斗争的事件，农民們对革命与反革命的認識如何呢？在《風波》里我們看到，农民們不但对革命毫無所知，而且还按照封建的旧观念生活着，不自覺地用行动去支持封建势力。

引起七斤全家的惶惶不安、混乱和痛苦的，不是反革命势力的抬头和封建势力的增長，而是七斤沒有辮子，而皇帝是要辮子的，沒有辮子似乎就不能逆来順受了。魯迅說过，長期处在黑暗的、野蛮的統治下的中国人民，始終在兩种交替的时代下生活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穩了奴隶的时代”。沒有辮子就不能适应封建势力的要求，也許“想做奴隶而不得”了。七斤嫂，是在封建势力重压下，变成落后、

無知的劳动妇女，听到皇帝坐了龙庭了，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似地说：“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直到她知道了皇帝要辮子而七斤沒有，才惶恐起来，責怪七斤不該在辛亥革命时候进城以致剪去了辮子。她不自觉的在因循旧有的观念和習慣，反对着生活中細小的变动，支持着封建观念的統治。

七斤，是个被雇佣的船夫，虽然他“早有些飞黃騰达的意思。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鋤头柄了”，但他仍属于被剝削被損害的貧苦农民之列的。虽然他“早晨从魯鎮进城，傍晚又回到魯鎮，因此很知道些时事”，知道的东西較一般人多，眼界比一般人大，但是在严重的封建势力重压之下，他是属于未觉醒的农民的。他的眼光是短淺，看得不远的，看不到“皇帝坐了龙庭了”对整个社会严重的利害关系，他对这次事情的全部認識仅在于有沒有辮子。是否当得穩順民。他是还未觉醒的农民的典型形象。

眼界比較大的、知道得比較多的七斤如此，一般人当然也是如此了。魯迅同时用烘托的手法写出全村的精神面貌，他們也为七斤沒有辮子而騷扰过。

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对人談論城中的新聞的时候，就不該含着長烟管显得那般驕傲模樣，所以對於七斤的犯法，也觉得有些暢快。他們也仿佛想發些議論，却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

七斤在村人里面，以前是“一名出場人物”，但自从村人知道皇帝坐了龙庭要辮子而七斤沒有，对他的态度就变了。

此后七斤虽然是照例日日进城，但家景总有些黯淡，村

人大抵迴避着，不再來听他从城內得來的新聞。七斤嫂也沒有好聲氣，還時常叫他“囚徒”。

被封建觀念深重地統治着人們，不自覺地用行動在支持、在維護着封建思想。難怪心腸最好的八一嫂說了几句解勸話，在人群中就那樣的孤立，最後被七斤嫂用“誰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漢的小寡婦！”一恨棒打了回去。

封建觀念很深的影響更表現于他們並不認識這種封建觀念的危害性，而且相反的用行動去支持，把它當作不變的生活邏輯和生活習慣來奉行；他們不認識革命，不知道要改革現狀，而把革命當作是与己無關的東西，反倒去適應那些封建勢力和因襲觀念。九斤老太說：“一代不如一代”。她只是保守、落后的从一些細小的事情上着眼，而留戀那些封建統治更為巩固時的日子。風波平息了，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給他相當的尊敬，相當的待遇了”。他們並未意識到這次風波的不合理，重新按照着習慣黯淡地生活下去了。在結尾時魯迅先生寫道：

六斤(七斤的女兒)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一支大辮子了；伊雖然新近裹腳，却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個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上一瘸一拐的往來。

這個細節的描寫，生動地表達了作者對封建統治所造成的惡果的憎恨，同時也表示了作者對不自覺地成為封建勢力的擁護者和支持者們的批判，而對他們所受壓迫和痛苦卻又表示了深刻的同情。

在一九一七年的農村的面貌為什麼如此呢？因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在農村中並未引起巨大的變化，也並沒有給

农民任何利益，更没有使农民获得解放。《風波》中不但写出了封建势力直接加于人民身上的压迫，更深刻地写出了封建思想在人民精神上、思想上的灭绝人性的蹂躏和杀戮。《風波》中清楚地可看到封建势力的代表者赵七爷是如何处心积虑地、不放过任何机会地在扩大封建势力的影响。

赵七爷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革命的影响使他把辮子盘起来，使他常常叹息。但是辛亥革命没有把封建势力打垮，赵七爷也没有被推倒。他在梦想“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他梦想有个能人来巩固地维护封建势力的统治。“皇帝坐了龙庭了”的风声传来，当然会使他活跃起来，他乘机想扩大影响，重新巩固地统治农村。他穿起那件“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时才穿的竹布长衫，侮辱和欺压农民了。他无耻地恐吓七斤一家人。以致弄得他们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几个剪过辮子重新留起来的人怕他看见而躲到人丛后面去。赵七爷是个精神贫乏、空虚和不学无术的人物，而在造谣生事进行欺骗和恫吓，努力扩大他统治农民的势力。赵七爷的狡诈、阴狠与七斤的淳朴、善良，确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們清楚地看到，就是这些与农民为敌的、时时想爬到农民头上去的、精神贫乏空虚的、无耻的地主，他们才直接是封建王朝的支柱和制造者。他们时时在盼望封建王朝的复辟，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势力。鲁迅先生对像赵七爷这样的封建势力的代表者，给予了无情的鞭撻。

在《風波》中，魯迅先生提出革命的教訓問題，這是有着重大的、極其深刻的社會意義的，正是希望以後的革命運動更深入、更徹底、更堅決，不要再像辛亥革命那樣。

資產階級在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充分暴露了它的軟弱和無力的事實，教育了魯迅先生去尋求和探索新的革命的道路，去深刻的分析社會，找尋新的革命的領導階級和基本力量，當時農民問題是他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同志說過，早期的一些革命作家，他們看得見小私有者的農民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於馴服的奴隸性，而往往看不到他們的“革命可能性”，看不到他們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後隱藏着革命的价值。魯迅早期的認識也是這樣的。因為當時無產階級暫時還沒有能和農民結合起來，農民還不能擺脫幾千年來封建壓力造成的落後和無知。在《風波》里，我們看到七斤以及周圍的人們都陷於無知、落後、保守中而不自知，魯迅先生對此也流露了失望和懷疑的感情。但是，這只是一時的，在一九二七年以後，魯迅先生看到了中國革命只有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取得勝利，而農民是無產階級可靠的鬥爭中的同盟軍了。

另外，我們在《風波》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封建勢力統治的深重；但另一方面，與《藥》等作品的环境比較起來，就削弱一些了。支持趙七爺空虛的信念的，只是十多本金聖嘆批點過的《三國志》，幻想中的假如“趙子龍在世”，以及信口說來的“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但是皇帝沒有坐成龍庭，風波平息了以後，趙七爺就沒有那麼威風了，而“又坐着念書了，辮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在《風波》這